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教材出版基金资助】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文学发展和演变研究中心基金资助】

中国古代小说文化学教程

万晴川摇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小说文化学教程 杨晴川主编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15辑)

陈星原 陈星原 陈星原 陈星原 陈星原

I 杨…

II 杨…

III 古典小说—关系—文化—研究—中国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7123号

出版发行：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5号加利大厦5号楼505室

邮购电话：010-64923300

电邮：yanys@163.com(发行部) yanys@163.com(邮购部)

编辑电话：010-64923300(总编室) 010-64923300(一部)

网邮地址：yanys@163.com

电子邮箱：yanys@163.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格：16开 787毫米×1092毫米 印张：15

字数：30千字

定价：25.00元 陈星原 陈星原 陈星原 陈星原 陈星原

本书编委会



万晴川摇何世剑摇袁九生
陈苗枫摇曹丽娜

目摇录

第一章摇古代小说与儒家文化	(员)
第一节摇概述	(员)
第二节摇儒学对小说创作思想的影响	(员)
第三节摇儒学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影响	(员)
第四节摇儒学与小说的情节建构	(员)
第二章摇古代小说与佛教	(员)
第一节摇概述	(员)
第二节摇佛教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员)
第三章摇古代小说与道教	(员)
第一节摇概述	(员)
第二节摇道教拓展了小说家的想象空间	(员)
第三节摇道教对古代小说主题思想的影响	(员)
第四节摇道教与古代小说的情节建构	(员)
第四章摇古代小说与民间信仰	(员)
第一节摇古代小说与巫术	(员)
第二节摇古代小说与命相术	(员)
第三节摇古代小说与占候术	(员)

第四节 中国古代小说与谶应	（四四）
第五节 中国古代小说与占梦	（四四）
第五章 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	（四四）
第一节 民间宗教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四四）
第二节 中国古代小说对民间宗教的影响	（四四）
第六章 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与传统文化	（四四）
第一节 中国古代小说《三国演义》与关公崇拜	（四四）
第二节 中国古代小说《水浒传》与江湖文化	（四四）
第三节 中国古代小说“西游”故事与教门文化	（四四）
第四节 中国古代小说包公故事与清官文化	（四四）
参考书目	（四四）
后记	（四四）



第一章 古代小说与儒家文化

第一节 概述

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古代小说无疑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儒学对古代小说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古代小说也加强、巩固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两者是互为影响的。

一、儒家的小说观

孔子、孟子、荀子是先秦时期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的时代，小说还在酝酿或正在萌芽，虽然没有直接关于小说的议论，但是他们的言论对后世的小说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孔子的言论，如“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这些言论实际上与今天意义上的小说无关，但是却常被后人引用来议论小说。班固《汉书·艺文志》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

采，此亦乌莠狂夫之议也。

“孔子曰”在今本《论语》中虽是子夏的话，但却未必不是述仲尼之意。其中的“小道”指的是技艺，很难说包括了“小说”，可以肯定，这段话不是专门谈小说的。班固借用孔子门徒的话来表明自己对小说的态度，代表了东汉以前正统思想家、文学家对于小说的看法。后世正统文人士大夫，常对班固的话进行发挥，竭力贬低小说，由此奠定后世儒学，同时是整个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对小说的根本态度，以至于在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里，很少人不是把“小说”作为“小道”看待的，使全社会形成了鄙薄小说的观念和小说家为人所轻视的处境及其自轻自贱的心态。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封建时代做了“君子”和一心想做“君子”的人不屑做小说。通达之士偶尔为之，也似乎为终身之玷。蒲松龄作《聊斋志异》，自叹“寄托如此，亦足悲也。”（《聊斋自志》）吴敬梓作《儒林外史》，他的朋友程晋芳惋惜曰：“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明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把小说比作“牛溲马勃”，清刘廷玑品题吕熊《女仙外史》曰“叟之书，自贬为小说”，云云，都表明了小说与小说家地位的卑微与尴尬。^①虽然这主要是历代统治者文化专制的结果，但孔孟的“小说”言论，正成了专制思想的基础或理论根据之一。

但汉志中“孔子曰”的这段话并没有彻底否定“小说”，因为它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小说的发展，孔孟学说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为小说辩护的根据，某些情况下甚至启发了小说家解放思想，创作出新的人物和故事情节”^②。

魏晋南北朝到宋代，随着儒家思想受到佛教、道家的冲击以及小说的缓慢发展，人们对于小说的认识也不再是单一化，出现了对小说

① 杜贵晨：《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0 页。

② 同上，第 240 页。

的多种认识^①。

明清时期,小说创作达到巅峰,小说观念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尽管正统的古文家是轻视和反对小说的,如黄宗羲《陈令升先生传》批评侯方域文“尚不能出小说家伎俩”,桐城派代表方苞亦力倡“雅洁”而反对小说笔法,姚鼎《复鲁絮非书》倡“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其学生吴德旋则将“忌小说”作为古文五忌之一,并批评柳宗元《宋清传》和侯方域文“不讲法度,且多唐人小说气”(《初月楼古文绪论》)。但有些学者和作家却突破了传统的儒家小说观念,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效应和艺术贡献,如李贽认为,《水浒传》之所以好,“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至清末梁启超等人将小说的地位大为提高,将其视为“文学之最上乘”和“改良群治”之利器。

综上所述,“早期儒家对‘小说’看法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视其为琐屑言谈,是‘小道’,‘君子弗为’;另一方面又认为‘尚有可观者’,‘然亦弗灭也’。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充分表现了儒家的功利观——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小说’,这在班固那里有清晰表述并得以凝固下来。后世正统古文家正是从前者出发否定小说及其手段。而思想活跃的有识之士则援引后者给小说及其手段以肯定,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学的发展,至明清之际后者逐渐占据上风。”^②

二、儒家思想影响小说的轨迹

儒家思想前期以孔、孟为代表,后期则以程、朱为代表。大致经历了从先秦孔孟儒学到两汉经学,再到宋代程、朱理学和明代陆王心学的发展过程。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封建统治更加严酷,统治者更注重儒家的政治教化功能,以此来维护、巩固其统治地位,从而

① 罗瑞宁:《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沿变线索浅析》,《南宁师志学报》1985年第1期。

② 张兴璠:《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以及历代古文家的“小说气”之争》,《铁道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使儒家思想的地位更加巩固。从总体上看,历代儒学都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仁、义、礼、智、信”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说教功能。

先秦儒家代表人物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都具有政治上的“民本”意识。从先秦儒家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表现了对人的关怀,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统治者残暴的不满。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著名的志怪小说《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冤魂志》以及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中,许多篇章都表现出了同情人民疾苦,反抗暴政和剥削的内容,这些作品无疑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东晋初年干宝所撰的《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其中有许多篇章都表现了反抗强暴和迫害的内容,代表作有《干将莫邪》、《韩凭妻》、《东海孝妇》、《丁姑祠》等。以《东海孝妇》为例,该篇写孝妇周青冤狱的故事,重点不是写孝,而是诉冤。主要情节是婆婆死后,因其女告官,诬妇为凶手,备受昏官之“拷掠”,遂成“冤案”。小说写了狱吏于公仗义执言,据理力争,最后只有“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同时写了后任大守“身祭孝妇冢”,为其申冤昭雪。这实际上是早期的一个公案故事。小说最动人之处是它的浪漫主义结尾。它的“青若枉死,血当逆流”的事实,控诉了官府的残暴,以“郡中枯旱,三年不雨”的报应,来表示她对人间不平的惩罚和反抗,真是感天动地,正气长存。孝妇周青的斗争性格是十分突出的。这个情节后来被元杂剧作家关汉卿吸取发展,创作了杂剧《窦娥冤》,成为不朽名著。《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历史、风尚的珍贵材料。其中有许多篇章,揭露了西晋统治者掌握了权力之后表现出来的极大的奢侈和贪婪,对他们暴殄天物、挥霍无度表示不满。

当然,还有一些作品宣扬了孝道思想,例如《李寄》(见《搜神记》卷十九),记述了一个智斩蛇妖、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的故事,热情地歌颂了她的聪明、智慧、勇敢和善良的品质,以此来宣扬儒家提

倡的孝道。李寄这位小姑娘在应募斩蛇时,对父母说过这样一段话:“……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从她的话中可明显看出她应募斩蛇是出于孝道。再从李寄因有功而受朝廷封赏的结局来看,小说的主旨是赞扬儒家提倡的孝道。还有《董永》中孝子董永,父死无钱安葬,便卖身为奴。他的孝心感动天帝,织女奉命下凡,与他结为夫妻,代偿债务,等等。又如《世说新语》中的《自新》篇,写一位“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的年轻人周处悔过自新,除三害,终于完成道德修养,成就事业,成为忠臣孝子故事。作品颂扬周处悔过自新的“善”,着眼于教育青年人要弃恶从善,才能成为忠臣孝子。其创作主旨是十分明显的,即宣扬“忠君报国,遵纪守法”的国家伦理,“以孝治天下”的家庭伦理,“仁”、“信”的个人伦理道德。还有《德行》篇中的幼年范宣,一日在园中挖菜,误伤手指,大哭起来。当别人问他是否痛得厉害时,他却回答:“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明明是为伤口疼痛而啼哭,却硬说成是触动了孝心才伤心地哭泣,这么小的孩子竟然也满口酸腐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唐代的思想文化政策比较开明,知识分子受儒家礼法伦理思想的束缚较少,思想较为开放。唐代科举取士制度的实行,为普通知识分子铺设了进身之阶,为他们展现出飞黄腾达的美好前程。这种社会现实不能不影响到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他们关心的不再是魏晋玄士那一套,而是非常现实的功名利禄和声色享受,“仕”与“婚”成为唐代知识分子的两大人生课题。“上述内容,当然可以通过诗歌,但诗歌传统上是表现高雅的感情,这种世俗的感情以小说的形式表达显然更为适宜。而且,小说不仅可以加进许多诗歌,兼具诗的功能,又可以从容不迫地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表达上述世俗感情也会更加具体细腻,收到更好的效果。”这是唐代传奇得以繁荣的原因之一。中唐时期,社会文化和经济高度发展,许多知识分子带着美好的梦想汇集长安,一下子就沉溺在繁华都市的声色歌舞之中。“于是这一时期传奇小说创作中爱情题材勃兴,而且多是写知识分子和妓

女或其他下层妇女的爱情。”由于知识分子的正式婚姻受到封建礼教的种种约束,所以“唐代知识分子在爱情追求中自然会遇到种种波折,产生种种矛盾,这样就产生了爱情追求中的道德评价问题。于是,道德评价就成了小说中作家主体色彩的一个重要内容”。^① 小说在道德评价时,总是推崇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因此,这部分唐传奇的创作思想,无疑受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和“文道合一”的文学观的影响,《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柳毅传》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唐传奇《柳毅传》是一篇糅合爱情与豪侠的小说,从小说的传书、拒婚、与龙女结合三个主要情节来看,作者主要是赞美柳毅重义轻身,救人于危难而不求报答的高尚行为。这种行为正是儒家所推崇“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仗义执言道德品质的生动体现。还有,故事的结局,不仅是柳毅因龙君馈赠而成为富户,与化为现实的范阳卢氏女的龙女结为夫妻,添丁发财,获得了人间美满的幸福生活,而且最后让他们成为神仙中人。可见小说作者正是以儒家“与人为善,仗义执言”的“仁、义、信”道德伦理作为主题思想进行创作的。《莺莺传》通过莺莺被张生抛弃的悲剧故事,极力宣扬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封建礼法,告诫青年男女不可违背封建伦理去“私奔”。在写到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的行为时,作者为之进行辩护。为什么张生的丑恶性膨胀行径没有受到责怪并得到辩护,而莺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却受到指责呢?这要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来解释。张生明显是儒家思想陶养出来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博取功名才是男性人生的伟大目标,至于爱情,只是“慕色”的附加物,并不属于很高的道德层。乱之弃之,丝毫不影响男子的名誉地位,甚至享有“才子风流”的称誉。张生正是出于“色”的需要而追求莺莺,又出于功名的需要而抛弃了她。这并不违背儒家对男性的

① 张稔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185页。

要求,因此爱情不能与功名相提并论。所以小说是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上来写爱情悲剧的,儒家推崇道德礼法的伦理价值观对其的影响不容忽视。

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为适应市民群众娱乐的需要,说话伎艺迅速发展并逐步成熟,话本在这种情况下,就大量出现了。宋元话本是由说话人面对面地讲给听众听的,话本必须考虑听者的需要,所以出现了许多反映市民方方面面生活的话本。当然,在这些话本小说中融入了市民的思想观念与美学趣味,而他们的思想仍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因此,小说中大量使用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教化民众。说话人之所以要这样,一是受着儒家教化至上文学观的影响,而且宋代社会上出现“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潮;二是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上千年的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在大众心上十分坚固,而且程朱理学在宋代有很大市场,理学家十分倡导,以小说为手段,改变人们气质之性不善的部分。说话人这样既符合市民的心理需要,又能调动说话人本身的热情,我们知道宋元市民阶层经济上、政治上都很软弱,他们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也受官府的剥削,稍有不慎,便会破产。“他们小心翼翼地生活,以求在统治者和社会的重压下,维持着自己的生计,并求得一些发展,所以他们来听书,不仅是为了娱乐,也是想从别人的人生经历中吸取人生的经验。”^①另外,说话人受到了理学家们人人可以成为圣贤观点的影响,于是,他们喜欢把品行高尚的人物形象置于曲折动人的故事中去熏陶、感染人心,并自觉地负起了改造人心、去欲存理的历史责任。通过对较为可靠的宋元话本考察,他们受封建理学的影响很大。《碾玉观音》的作者确实对璩秀秀与崔宁的爱情悲剧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但也用他们夭亡的结局告诫人们“非礼莫为”。《志诚张主管》是作者树立的一个正面形象,正因为他“非礼勿动”,敬心诚意,不贪

① 张稔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9 页。

主母之色，才避害远祸。作者评论道：“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心人。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错斩崔宁》中的三条人命，源自于刘贵不诚实的言语，十五贯钱明明是老丈人借予的，他回家后却偏偏说是卖二姐的身价，以致招来大祸。作者最后总结这一教训说：“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语酿灾危。劝君出语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诚，是理学家极为重视的品质。二程说：“盖诚之于物，无不能动，以之修身则身正，以之治事则事得其理，以之临人则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①《志诚张主管》实际上讲的是一个“诚”字，张主管是正面形象，《错斩崔宁》中刘贵则是不诚而致祸的典型。《冯玉梅团圆》中的范鳬儿夫妇之所以能够破镜重圆，一是范鳬儿为“读书君子”，“不做伤天理的事，获阴德积善之报”；二是夫妻两人坚守夫妇之道：“夫不再娶，妇不再嫁。”不伤天理，才会感动皇天，安排他们在人海之中重新聚首；守夫妇之道，长期为孤男寡女，才使夫妻再合有了可能。小说的写作意图再明显不过了：遵守天理，就会由逆境转至顺境。《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是一个不合封建礼制之人，她多言快语，口利如刀，结果，被夫家逐出，被娘家埋怨，只好“剃了头发做师姑”。作者的目的是要天下的“长舌妇”以她为鉴，用“理”来约束自己，做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贤淑女子。《五戒禅师私红莲》以五戒禅师的死亡结局象征性地说明了理与欲的尖锐对立，五戒禅师“一时差讹了念头，邪心遂起”。当此事被人戳破后，便“合掌坐化”，进行了最严厉的自我惩罚。

“另外，讲史类的话本《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大宋宣和遗事》等等，莫不以理为出发点。《宣和遗事》开篇云：‘暂时罢鼓膝间琴，闲把遗编阅古今。常叹贤君务勤俭，深悲庸主事荒淫。致平端自亲贤哲，稔乱无非近佞臣，说破兴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说平话的重要任务是总结历史教训，以垂戒

^① 《二程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80 页。



来世。”^①

为文人士大夫创作的宋元文言小说,虽说是由唐传奇继承而来,但在思想内容上与之大不相同,他们受理学的影响非常深刻,载道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中指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极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如《绿珠传》写石崇之婢妾绿珠,拒不受辱,坠楼身死。作者在文后议论说:“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其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行、怀反复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视,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炫美丽、张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负义之类也。”张实的《流红记》写一秀才与宫女的天作之合的婚姻,二人虽然寂寞无聊,然皆未逾越礼教,于是,老天让他们成了眷属。作者在文末议论说:“夫天理可合,悦于得,好于求者,观此可以为诫也。”这里把“天理”这一封建道德神秘化,认为它有一种支配人命运的力量。其他如《杨太真外传》、《楚王门客》、《西池春游》等,大多如此。

元代从世祖忽必烈开始,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开始重视儒学。元初的大儒如北方的许衡、南方的吴澄都为元统治者的文治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元仁宗皇庆年间,规定开科取士,试经义以朱熹章句集注为主,开始独尊程朱理学。至明初,成祖命胡广、杨荣等编《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并指定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县学生员必读之书”。又以八股取士,命题依据朱熹注四书及宋儒注五经。程朱理学已成为官方哲学,社会也广泛接受,小说创作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明初的“三灯”。瞿佑的《剪灯新话》把风流与礼防异相共构,李昌祺的《剪灯余

① 朱恒夫:《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 页。

话》发挥道德训诫的功能,作者笔下的男女风流是以遵循道德规范为前提的,邵景詹《觅灯因话》的内容“非幽冥果报之事,则至道名理之谈”,其中写了施济的救拔穷困(《桂迁感梦录》)、郭雉真的坚贞不屈(《贞烈墓记》)、妓女翠娥的“甘心对冰雪,不爱艳阳春”(《翠娥语录》)、孙恭人的贞贤(《孙恭人传》)、唐珏的忠义(《唐义士传》)等。明初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表现了对处于战乱之中的三国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对残酷的乱世的惧怕,对仁君贤臣和由他们创造的太平世界的向往。其推重刘备关于妻子如衣服的言论和刘安杀妻招待刘备的情节,更是带有浓缩的程朱理学色彩。

至明中叶后,程朱理学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抨击,它已失去了维系封建道德的张力。王阳明说:“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痼,所望以起死回生。”所以他继承发挥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标举“良知”,提倡“六经注我”,认为我心即宇宙,否定权威,推倒偶像,强调人心之巨大作用和自由性,而不拘囿于儒家经典教条,承认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和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解放的嚆矢。尤其是王学左派王艮、李贽等人,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的理论和“童心说”,承认情欲的合理性及巨大功能,认为情欲是一切生命的本原,冯梦龙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因而积极倡导“情教”。清初的唐甄说:“生我者欲也,长我者欲也。”戴震则说:“凡事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

阳明心学对明中叶至清代中叶的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家们在这样的理论旗帜的指引下,不再用虚构的儒家伦理的模范人物与理想生活来引导大众作符合“天理”的人生价值取向,而是去描写形形色色的真实的现实生活,去塑造普普通通的现实人物,引导大众从常人的生活中、常人的经历中去思考和观察,从中寻求社会健康发展之“道”,对在变化的潮流中晕头转向的众生进行一些切合实际的指导与规劝,达到天理昭然、人心纯正的目的。于是,便有了《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同时,它也引导文人跳出程朱的束缚,重新审视天理和人欲,于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小说界创作



了一批肯定“人欲”的小说,对自然情欲的追求给予一定的宽容与赞赏。如拟话本“三言”与“二拍”。另外,从小说的接受者来说,现实生活的迅速变化也使他们产生艺术欣赏的新要求,他们除继续对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话故事感兴趣外,还希望通过其他小说作品,去认识现实生活,而世情小说的出现也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求。总之,受心学影响而兴起的世情小说,慢慢地在数量与质量上超越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志怪等,成为最优秀的小説种类。

一方面,“三言”中有不少写男女爱情的作品,实际上不是写爱情,而是写情欲,写以生理本能为基础的性爱,如《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中的卖油郎秦重,在和妓女辛瑶琴的爱情故事中,并没有高雅的情致,而只有粗鄙的欲望,这些作品都肯定了个人的私欲,他们的行为与传统礼教不是很吻合,但也没有反对封建礼教;另一方面,“三言”中也有不少作品重视对普通百姓的“情”的表现,有表现男女之情的作品,如《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警世通言》卷二十二),有表现夫妻之情的作品,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还有表现朋友之情的作品,如《吴保安弃家赎友》(《喻世明言》卷八)等,当然,这些情都没有否定社会传统的理性。后来,由于受到王学左派的影响,一些小说家走向极端,对程朱理学进行畸形反叛,创作了大量色情小说。

《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众多的书痴、石痴、酒痴、情痴、花痴、琴痴、鸟痴等人物形象,也是受阳明心学影响的产物。《红楼梦》中的“童心”崇拜则显然受到“童心说”的影响。宝玉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他喜欢大观园中的女孩儿,认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了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这是因为女孩子长在深闺,几乎与外界世界隔绝,“道理闻见”不得而入,所以易于保持童心;而一出嫁,从此“染了男人的气味”,童心也就开始丧失。《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也是具有童心的人。

由于王学左派的推波逐澜,遂渐形成一股强大的个性解放思潮,加上商品经济的繁荣为享乐提供了物质保障,人的欲望的“潘多拉之盒”终于被彻底打开了。人们追求享乐,纵情酒色,世风败坏,人情浇薄,于是劝诫小说大量出现。

《金瓶梅》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统治阶级完全没落腐朽,他们没有理想、没有道德,只是拼命地进行物质的享受,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社会的发展完全偏离了“天理”的规定,为恶的生活得如鱼得水,大权在握,胡作非为,却没有被指责,更没有被惩罚,相反,倒引起全社会人的羡慕。于是纲常法纪形同虚设,仁义道德撇在一边。另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丑陋的两性关系。作者精细逼真地描摹这一幅幅堕落的社会图景,目的是让人们看到社会现状的不堪和人性的丑恶,并在批判性的描写中树立人间正道,即纲常振举、仁义遍行。它隐含着这样的目的:希望读者见到那些丑陋的人生后引起自我的反省。正如作者在小说开篇时就吟咏的《四贪词》,它分别批判了热衷于酒、色、财、气之人,劝诫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而纵观全书,他又主要表现了好色的危害,以此来劝诫众生,“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见《东吴弄客序》,《金瓶梅词话》),西门庆以财色死。

《石点头》、《醉醒石》、《清夜钟》等小说简单地将道德的沦丧归咎于人性的弱点,所以作者总是用因果报应的模式来结构故事,所谓“作善作恶,必有报应,只是来早来迟,到头方见。奉劝作恶的,不要使过念头;作善的,不要错过善因。”作者深信人们读了他的作品后,必会悚然惊醒,从而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另外,小说还有强烈的补天意识,针对世上“为善未蒙福”,“为恶未蒙祸”;“孝而召尤,忠而被谤”;“施恩而遭负心之友,善教而得不令之徒,媚背义翁,奴欺仁主”;“名才以痼疾沈埋,英俊以非辜废斥”(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序》)等不胜枚举的缺憾,小说家企图以文代石,将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缺憾,以虚构的理想来弥补,幻中求真,给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以